

DOI:10.3969/j.issn.1672-1101.2025.05.009

古代帝王陵“墓祭”问题研究

刘 毅^{1,2}

(1. 安徽理工大学 淮楚文化研究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2.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帝王陵墓的“墓祭”问题是考古学和古代礼制研究中的重要关注点,综合多种资料分析,“古不墓祭”应该是东汉早期以前帝王陵墓祭享的真实情况。东汉“上陵礼”正式开启了帝王陵墓的政治礼仪性祭祀活动,此后“墓祭”越来越被重视,明初取消了至少因袭一两千年的寝宫供养,陵上献殿之祭趋同于太庙。礼制的变革演进,也导致后人的认识出现了歧义。

关键词:帝王陵墓;礼制;墓祭;上陵礼;寝宫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25)05-0081-10

Research on “Tomb Sacrifices” in Ancient Imperial Tombs

LIU Yi^{1,2}

(1. Huai-Chu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inan, Anhui 232001,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tomb sacrifices” in imperial mausoleums is a significant focus in 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ancient ritual system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various sources, “no tomb sacrifice in ancient times” should be the true situation of imperial mausoleums before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Shangling Ceremon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officially initiated the political and ceremonial sacrificial activities in the imperial mausoleums. Since then, “tomb sacrific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value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sacrificial offerings in the bedchamber, which had been passed down for at least one or two thousand years, were completely abolished, and the sacrificial offerings in the mausoleum were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ritual system led to misunderstandings among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imperial mausoleum; ritual system; tomb sacrifices; Shangling Ceremony; bedchambers

先秦有无“墓祭”是考古学和中国古代礼制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关于帝王陵寝制度研究中,不同认识自古有之。1980年前后,因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_厝墓中“兆域图”的出土引出关于墓上建筑功能的判断,进而引起了新的学术争议。就古代帝王陵墓而言,“墓祭”问题提出于东汉、墓祭有无之争更多集中于清代以来,因而讨论对象的年代应该从先秦下移。从提出问题的原点入手,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最优途径。

一、“古不墓祭”与“古有墓祭”异说溯源

“古不墓祭”之说出现于东汉(25-220年)。王充(27-约97年)在《论衡·四讳》中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1]最早正式提出“古不墓祭”之说的是汉末蔡邕(133-192年)。他认为:“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2]¹⁴ 黄初三年(222年),魏帝曹丕下令废除陵寝制度的诏书

中有云:“古不墓祭,皆设于庙。”^{[3]632}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持古无墓祭之说,并据以解释《礼记·曾子问》中“曾子问:‘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何?’孔子曰:‘向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一段话,认为墓祭只是“礼之权也”;汉明帝行“上陵礼”于光武帝原陵,“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传之以为盛节,故陵之崇庙之杀也,礼之渎敬之衰也”^{[4]1156-1159}。后来赵翼在吸收“古有墓祭”之说的基础上提出:“盖三代以上本无墓祭,故辛有见被发祭野者而以为异。”“《孟子》东郭墠间之祭虽属设辞,然其时必已有此俗。《史记》:孔子没,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是春秋战国时已开其端。”^[5]现代研究者杨宽持“古不墓祭”之说,认为先秦墓上建筑不可能用于祭祀,商周墓上建筑是供奉墓主灵魂生活起居的“寝”,墓祭应该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6]。

清人阎若璩明确持“古有墓祭”之说。他认为:“《成阳灵台碑》:‘庆都仙歿,盖葬于兹,名曰灵台,上立黄屋,尧所奉祠’。非墓祭之见于集乎?《韩诗外传》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亲存’。非墓祭之见于子乎?《周本纪》:‘武王上祭于毕’。毕,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见于史乎?《周礼·冢人》:‘凡祭墓为尸’。非墓祭之见于经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鲁城北泗上,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岂有非礼之祭而敢辄上圣人之冢者哉!”^[7]这是阎氏根据《孟子》关于东郭墠间之祭的寓言,再摭举经、史、子、集中的有关记载,以佐证自己的古有墓祭之说。现代研究者郭宝钧在《辉县发掘报告》中倾向于“古有墓祭”^[8]。杨鸿勋根据殷墟王陵区人祭遗存的考古资料^[9],认为至迟商代已有墓祭;中山王𰽭墓出土《兆域图》标示其墓上建筑曰“堂”,可由此确定先秦墓上建筑不是寝,而是享堂;“墓上建宗——享堂,属殷商的一种制度”^{[10]66}。他认为“秦开始才在陵墓原有的‘堂’之外,又添置了‘寝’。这样,堂是为前朝,寝是为后寝。先秦陵墓只有堂而没有寝”^[11]。他还根据偃师二里头2号宫殿遗址的发掘资料^[12],认为“殿堂虽不建在墓上,但整组建筑是坐落在墓上的。如果发掘判断无误,是否表明这是一个宗的建筑群体,是很值得研究的”^{[10]87}。

二、“古不墓祭”的“祭”是指什么?

讨论上古时代是否有“墓祭”,首先应厘清“古

不墓祭”说的语境,特别是其中的“祭”究竟指什么。

随着墓葬制度的逐步健全,人们对于先人墓葬的重视程度也在同步增长,在墓地近处会举行一些尊崇、供享祖先的行为。在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墓主骨架两侧有蚌壳堆塑龙、虎图案)南端20米处发现一组蚌壳图,有龙、虎、鹿、蜘蛛等;再南25米处又有一组蚌壳图案,为虎、人骑龙。发掘者推测这两组堆图可能是致奠45号墓的墓主的遗物^[13-14]。多项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许已有礼敬墓主的行为。一些商代大墓上有同期建筑遗存,如殷墟5号墓(妇好墓)的墓口之上叠压商代房基,有排列整齐的6个柱洞,洞内以河卵石填实用作柱础^{[15]6};这类建筑无疑与享祀墓主的行为有关。另外,殷墟王陵区以东的西北冈东区先后发现2500余座排列密集的以人祭为主的祭祀坑,根据坑本身及埋藏物特征,研究者将之分为若干组,一组坑内通常有几十至上百、最多达数百个“人牲”个体,每组分别对应一次祭祀活动,这片祭祀坑是多年频繁使用而逐渐形成的^[16]。遗憾的是,这种以人牲“祭祀”的行为或礼仪规范,以及它们和商王陵墓的对应关系,今人已难述其礼制层面之详。

《孟子·离娄下》讲了一个墓前供祭的故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饕餮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饕餮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墠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饕餮之道也。”^[17]《孟子》以设喻的方式讽刺了战国时期爱慕虚荣而无廉耻的一类人,这个文本反映出在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时代,至少齐鲁大地“坟间之祭”是常见的行为,其内容则是供奉酒食。又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大臣朱买臣(?—公元前115年,吴县人)贫贱时曾被妻子抛弃,他“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18],可证西汉中期江南亦有上冢供奉饮食之俗。古籍中这些清晰的、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墓地供食记录,应该是可信的。战国以前墓上献食之俗可能已经存在,其理论依据是“鬼犹求食”^[19],根源于“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20]这种当时普遍的社会观念。

关于汉以前墓上献食等活动的名称,《殷周金文集成》著录有一件“享陵”铭鼎^[21],有研究者认为,此

类鼎即专为享陵供食而用^[22],其说甚是。《说文》:“享(享),献也,从高省,曰象进孰物形。《孝经》曰:‘祭则鬼享之。’以献食为核心的墓上之‘祭’恰应属于‘敬享’,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古代文献表述以前,这类行为可名曰‘享’,以与‘祭’相区别。献食是帝王陵墓上建筑的主要功能之一,而且献食之祭应该以一定的代际为限。妇好墓填土与墓上房基被商代晚期的灰坑打破^{[15]4-5},类似现象在侯家庄1001大墓上也有发现^[23],这表明在某个时间节点停止了对墓主的供享。笔者推测,其行为可能和宗庙中的‘祧’制相似。汉元帝时始议汉家祧庙之制,韦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太上皇庙主宜瘞园,孝惠皇帝为穆,主迁于太祖庙,寝园皆无复修。’^{[24]3120}所说两个事项,一是按亲尽则祧的原则,停止当朝皇帝远祖的宗庙之祭,神主迁祔太祖庙(太上皇为汉高祖之父,故瘞于园寝);二是已祧之祖的‘寝园皆无复修’,则是要停止陵墓寝殿供养甚至寝园之制。妇好墓上房基打破现象,或许性质近似。

中国上古的“祭”是按固定规则举行的政治性礼仪行为,不能随便、随时举行。前述“上冢”“祭”之类基本局限于上食等行为,与礼制范畴的“祭”有明显的区别,绝不是蔡邕等人所说的“墓祭”。《礼记》中孔子关于庶子无爵者“望墓而为坛以时祭”的表述^[25],也可以旁证先秦墓上并没有专门用于礼仪性祭祀的建筑,所以正规的告祭活动要另外“为坛”行事。两汉皇陵中的寝殿是先秦墓前献食场所的延伸,其主要功能就是包括供奉饮食在内的“事死者如事生”,这种行为并不是礼制层面的“祭”。时人记西汉晚期皇室祭祖之制:“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与郡国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24]3115-3116}如此,西汉皇室的奉先之处有庙、寝、便殿三处,具体功能各异。庙即宗庙,一般建在都城內,其祭祀活动是国家重大典礼之“祭”。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最初在长安城內东南建庙奉祀汉高祖,因为每月“游衣冠”须自渭北长陵中的寝(一说是自未央宫以北的寝)到高祖庙,衣冠所行经过皇宫复道(连接未央宫与长乐宫)之下,有不敬祖先之嫌,于是孝惠帝接受叔孙通的建议,在长陵附近为高祖重建宗庙,称“原庙”。以后西汉诸

帝皆缘此制各在陵旁立庙,这些庙虽然都在皇陵附近,但却是宗庙,在礼制规范上并不是陵墓设施,其祭祀活动也不是陵园的奉祀内容。西汉宗庙既不同于《周礼》等规范的以昭穆为序的集中群庙制度,也不同于唐宋等后朝列祖列宗共庙的“同堂异室”之制。西汉时期,“陵”“庙”建筑相望,“陵”“庙”之祭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在礼仪层面各行其是。

寝殿和便殿是西汉皇帝陵园中的重要设施,陵墓享祀活动在此举行。西汉早期一重陵园,帝后陵墓封土、寝殿、便殿都在陵城內,如高祖“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官寺皆在中”^[26]。从文帝霸陵开始,陵墓制度进一步规范,根据霸陵^[27]、景帝阳陵^[28-31]、武帝茂陵^[32-33]、宣帝杜陵^[34-35]等考古发掘资料,霸陵及以后各陵的寝殿、便殿皆建在陵园內城之外、外城之内,帝后各为一组。《三辅黄图》说:长陵“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侧,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36]。寝与便殿仿拟墓主生前生活区域即所谓“后寝”,而不是处理政务的“前朝”,因而其核心功能与象拟朝堂的宗庙有严格的区分。以杜陵为例,寝殿象征生前居住的正宫路寝,所以寝园西院是高台大殿式建筑;所谓“日祭于寝”的重要内容是“日四上食”。《独断》说:汉代“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2]14}。便殿象征晏闲休息处,因而寝园东院是小型院落,这个区域中应该还有“掖庭诸官寺”。总之,西汉帝陵奉祀的核心工作是帝后日常生活起居,局限于象征意义的“事死如生”,其行为不属于三《礼》所规范的祭祀,政治意义与庙祭不可同日而语。寝殿、便殿等陵上之享与宗庙之祭分属于两个不同范畴,在汉代本无疑义。《汉书》记载: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孝元帝崩,“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37],即是一例佐证。

这种庙祭(国家政治行为)、陵享(视死如生的日常供养)两种平行线式的奉先之制,在东汉初年因孝明帝于光武帝原陵前举行“上陵礼”而发生了变化。

汉明帝于光武帝陵前举行的“上陵礼”是正规的礼仪性祭祀活动。晋人司马彪记载:“(上陵)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折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

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礼乐阙,(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敬爱之心也。周遍如礼,最后亲陵。遣计吏,赐之带佩。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38]3103}可见,“上陵礼”的主旨不再是以上食和敬奉衣冠为事,而是被赋予了鲜明的礼仪和社会政治色彩,它与上古乃至西汉原有的“上冢(陵)”“祭”墓有本质的区别,是载入国家祀典的政治礼仪活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帝王陵“墓祭”的开始。它的推行,使陵寝在以往寝园“事死如生”的奉先功能外,增加了政治典礼性活动,开始具备了礼制性的祭祀功能。《晋书》认为:“古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寝。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3]933}顾炎武直接指出:“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4]1163}除最初的原陵和幼殇皇帝的陵墓外,东汉皇陵皆兼设石殿和寝殿,寝殿供奉墓主起居如旧,而石殿则是举行上陵礼的场所。根据东汉皇陵的考古资料,用于上陵之礼的石殿和日常供养的寝殿是两组不同建筑,寝殿通常建于石殿的东北,与园寺吏舍等相连^[39-43]。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祭祀,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区域举行,表明了它们在当时不被视为是一事。东汉末去古未远,蔡邕正是亲眼看到了这种根本性的差异,才有“古不墓祭”之说。汉灵帝建宁五年(172年)正月:“车驾上原陵,蔡邕为司徒掾,从公行。到陵,见其仪,忼然谓同坐者曰:‘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隐,不可易旧’……邕见太傅胡广曰:‘国家礼有烦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广曰:‘然。子宜载之,以示学者。’邕退而记焉。”^{[38]3101-3104}这段记载准确反映了蔡邕亲见上陵之礼后的心路历程。充分考虑“古不墓祭”说出现的时代背景,对于准确理解其最初的含义十分重要。

先秦是否有“墓祭”,墓上建筑性质的判定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基本认同杨宽教授的判断:先秦墓上建筑应该是“寝”。无论其名称、位置如何变换,这些墓上建筑的核心功能都是《后汉书·祭祀志》中所谓“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妆]具”^[44]。至于认为“寝”出现于秦始皇陵,应该是误解了蔡邕的文意。蔡氏《独断》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2]14}文中“出寝”

之“出”,并不是“出现”,而是使意动词,为“迁出”之义。对于同一事件,《汉旧仪》的记述更清晰准确:“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其亲寝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庄[妆]具。”^[45]也就是说,古代帝王陵墓本有寝,到秦始皇营造陵墓时把寝迁出(另一种理解是寝自宗庙迁出),起建于墓旁。结合早于始皇陵的妇好墓、辉县魏王墓、平山中山王墓等实例分析,所谓“出寝”,应该是由墓顶迁至墓侧。考古资料显示,秦始皇陵封土顶部没有发现建筑遗迹,其寝建于封土以北偏西约50米处^[46-47]。这种变革或许与秦始皇的专制独尊倾向有关。汉承秦制,在陵园中各设寝殿,用于奉衣冠、备饮食,还是沿用古代寝的本意。上陵礼初始,权行礼于光武原陵上旧有的寝殿(旧寝供养功能如故),后来才出现了专门用于上陵礼的石殿。

综上所述,“古不墓祭”之说正确表述了上古乃至西汉帝王陵墓的相关礼制,其时墓上或墓旁用于祭享的建筑,性质都应该是“寝”。“古有墓祭”说的出现,是后人(主要是清人)误解了汉人本义,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早期以后,帝王陵寝祭祀制度的变化,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解。

三、“祭”“享”消长——“上陵礼”的流变

东汉以后,魏晋彻底废除陵寝制度,上陵礼和寝殿供养等一并取消。东晋南北朝,陵祭之礼间或行之,到唐代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制度。

据《开元礼》《新唐书》等记载,唐代皇陵祭祀分为陵前之祭和寝宫之祭两部分,分别继承自汉代上陵礼和寝殿便殿之祭。先是陵前之祭。皇帝亲祭,预设拜位于陵东南隅,西向,遇冈阜间隔,则随地之宜。祭祀日天明前五刻,陈设黄麾大仗于陵;天明前三刻,行事官及宗室亲五等、诸亲三等以上并客使之当陪祭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马,设华盖、伞、扇,侍臣骑从,到陵前小次。皇帝步出小次,到拜位,“再拜,又再拜;在位皆再拜,又再拜。少选,太常卿请辞,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礼曰:‘奉辞。’在位者再拜”。礼毕,皇帝还于小次。皇帝乘马到寝宫前之大次,仪仗护卫前导后扈随行。百官、宗室、诸亲、客使各依序立于大次前。皇帝步行至寝宫南门,仗卫止于门外。皇帝入寝宫,由东序进至寝殿陛阶东南位,再拜;

自东阶上殿,北向再拜,又再拜。进殿省视先帝服御玩好,擦拭床帐等家具,然后“进太牢之饌,加珍馐”。皇帝到殿外酒尊处亲酌酒,进殿,三奠爵,向北而立。太祝二人在殿外持玉册,面东跪读。皇帝再拜,又再拜,出殿门面北立。太常卿请皇帝辞先帝,皇帝再拜,出东门,还于大次,礼成。唐代皇帝亲祭陵之例不多,有贞观十三年(639年)正月初一唐太宗亲祭高祖献陵,永徽六年(655年)正月初一高宗亲谒太宗昭陵,开元十七年(729年)十一月玄宗亲谒桥、定、献、昭、乾五陵。“自开元十七年后,无亲谒陵事。”^[48]⁴⁰⁰如皇帝不亲祭,则以太常卿代行,陵台令、奉礼郎等从祭,在陵南百步道东设次行礼。

唐制,每年二、八月公卿巡拜各陵。《开元礼》称:“每年二时,遣三公分行诸陵,太常卿为副。”^[49]贞元四年(788年),太常寺据旧礼更定仪制,“所司先撰吉日,公卿轺车卤簿就太常寺,发抵陵南、道东设次,西向北上。公卿既至次,奉礼郎设位北、门外之左,陵官位其东南,执事官又于其南。谒者导公卿、典礼导众官就位,皆拜。公卿众官以次奉行,拜而还”^[50]³⁶⁴⁻³⁶⁵。唐代公卿行陵,同样源出东汉上陵之制,是政治典礼性的祭陵活动,除依例祭拜外,还象征性地“扫除枯朽”“芟薙繁芜”,以应春秋二季。

唐代祭陵的地点,寝宫(也称“下宫”)之祭明文记载即在寝殿,毋庸讨论;陵前之祭的行礼之处却没有专用名称。皇帝亲祭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将作预修理拜谒之所及寝宫,务相洁敬”“又于谒拜陵所之道西量设小次,又于寝宫前之西南设大次”^[51]。这个“拜谒之所”应该不同于东汉石殿(后代一般称“献殿”或“享殿”)一类,似乎不是固定的建筑物。从各陵前地貌来看,其恰当的位置,应该在皇陵宫城(也称“上宫”)的南司马门一带。唐陵上宫有无献殿未见明文记载,也没有考古发掘资料佐证。昭陵九峻山南有两个土阙基址和大量残砖断瓦,1964年曾出土一件高达1.5米的屋脊鸱尾,推测是献殿遗物^[52]。据说文宗章陵的献殿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50米、东西70米^[53]⁵。此外,两《唐书》中都有宪宗时大风损毁德宗崇陵上宫“衙殿”的记载^①,此“衙殿”或即上宫中的主体祭祀建筑,但“衙殿”首见于何时(陵)却不得其详,或在肃、代、德三帝之世。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院)对于部分唐陵的寝宫进行过勘探发掘工作,如高祖献陵最初的寝殿遗址^[54],还有太宗昭陵^[55]、高宗乾陵^[56]、睿宗桥陵^[57]、玄宗泰陵^[58]、德宗崇陵、文宗章陵^[53]³⁻⁸、宣宗贞陵^[54, 59]寝宫等。唐代皇陵的寝宫制度确立于乾陵,其遗址位于神道南起第一、第二道阙之间中轴线的西侧,所在地势平缓。内外两重宫城,内城范围内共发现遗迹60处,两重城之间也有大量建筑遗迹。乾陵以后诸陵的寝宫一般都建于陵山下、第一至第二道阙之间神道西侧的缓坡上,地势通常北高南低。下宫距陵山一般五里左右,个别稍远。根据考古资料和《唐会要》、《长安志》、两《唐书》等文献记载分析,唐各陵寝宫规模小于陵宫,但各有宫墙、宫门、寝殿等主体建筑,还有奉陵宫人居所、官署、厨房、水井等附属设施。寝殿是下宫的核心建筑,内设神座等一如生前所居正寝。永徽六年(655年)正月初一日,高宗亲谒昭陵,上宫礼毕,“又改服奉谒寝宫,其崇圣宫妃嫔、大长公主以下及越赵纪三国太妃等,先于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上入寝,哭踊绝于地。进至东阶,西面再拜,号恸久之。乃进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无忌、司空勣、越王贞、赵王福、曹王明及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并入执爵进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阅先帝先后衣服。拜辞讫,行哭出寝北门”^[48]⁴⁰¹。这个事例补充了唐陵寝宫及其奉祀的细节。

根据前揭各文献记载分析,唐朝的祭陵活动虽然先祭陵前、再祭寝宫,但实际更重寝宫之祭。唐人认为:“惟有寝宫安供养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奉之仪。”^[60]寝宫之祭仍旧以供奉饮食起居为主,“凡国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腊、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而日进食。又荐新于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50]³⁶²。相比汉代寝殿之日四上食,唐陵寝宫供养有所简化。本来献、昭二陵在三年服丧期满后,都曾将每日进食简化为节序进食,永徽二年(651年)有司奏请“先帝时,献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伏、腊、清明、社上食,今昭陵丧期毕,请上食如献陵”,高宗从之^[50]³⁶²。景龙二年(708年),太常博士彭景直针对三陵日祭繁琐上言:“在礼,陵不日祭,宗庙有月祭,

① 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七之《五行志》:元和“八年三月丙子,大风拔崇陵上宫衙殿西鸱尾,并上宫西神门六戟竿折,行墙四十间檐坏”(朱东润等点校本第4册第136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三五之《五行志二·常风》:元和“五年三月丙子,大风毁崇陵上宫衙殿鸱尾及神门戟竿六,坏行垣四十间”(点校本第3册第90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故王者设庙、祧、坛、墀,为亲疏多少之杀。……臣谓宜罢诸陵日祭,如礼便。”唐中宗不准:“有司言诸陵不当日进食,夫礼以人情为之沿革,何专古而泥所闻?乾陵宜朝晡进奠,昭、献二陵日一进,或所司乏于费,可减朕常膳为之。”^[61]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诏:“献、昭、乾、定、桥五陵,朔、望上食,岁冬至、寒食各日设一祭。若节与朔、望、忌日合,即准节祭料。桥陵日进半羊食。”天宝二年(743年)八月“始以九月朔荐衣于诸陵。又常以寒食荐饧粥、鸡球、雷车,五月荐衣、扇”。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宰相奏请:“诸陵以朔、望奠,亲陵以朝晡奠,其余享及忌日告陵皆停。”^{[50]364-365}元和十五年(820年)奏准:“皇祖以上至太祖陵寝,朔、望上食,其元日、寒食、冬至、腊、社日各设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外,每日进食。”^{[62]408}至此,停当朝皇帝祖父以上各陵之日进食,乃成定制。寝宫日常供奉之外,高宗时还曾送鹰犬于山陵以供先帝神魂娱乐,玄宗初诏令停止。“开元二年(714年)四月十五日敕:顷者别致鹰狗供奉山陵,至于料度极多费损,有乖仪式,无益崇严。其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并宜即停。”^{[62]406}值得注意的是,从相关的讨论、记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唐人对于陵前、寝宫这两种“祭”不再如东汉那样严格区分,在唐人认知中陵前之祭不是“非礼之礼”。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敕令将寒食上墓编入五礼,在国礼层面进一步肯定了墓祭。

两宋皇陵如唐制上、宫分建,只是因为惑于“五音姓利”之说,下宫通常建于上宫的西北方向。河南巩义宋仁宗永昭陵下宫位于帝陵上宫北偏西、皇后陵宫城正北,1986年曾进行过钻探^[63],遗址范围南北163米、东西130米,门开于南,地表现存守门石狮1对、上马石2件,柱础2方。在遗址的北边中部发现2座南北相连、略呈“工”字形的夯土台基,台基上均有青石柱础。夯土台基的东西两侧发现有南北向的夯土,推测是环绕寝殿的廊庑遗址。在两侧廊庑遗址与东、西宫墙之间的空地上,还有不规则的夯土、砖瓦和砖铺地面等遗迹,推测是宫人居住或其他用途的侧院。宋陵下宫各建筑名称及相应陈设和功能,据当时人目睹英宗永厚陵之制:“有正殿,置龙輶,后置御座。影殿置御容。东幄卧神帛,后置御衣数事。斋殿旁皆守陵宫人所居。其东有浣濯院,有南厨。厨南陵使廨舍,殿西副使廨舍。”^[64]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至道三年(997年,是年三月

太宗崩)八月二十三日,诏于永熙陵下宫置殿,奉安太宗圣容。置卫兵五百人守奉,朝暮上食,四时祭享。”^[65]又,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十九日,真宗崩;三月十八日,“内园副使岑守素言:‘准诏写大行皇帝圣容,其一常服,用神御帐,其一服通天冠、绛纱袍,用行殿。其帐、殿前各设香炉合烛台,委少府监修制。还京日,真容止安匣内’。从之”^[66]。结合这些记载推知,永昭陵下宫遗址中的“工”字形宫殿建筑,其南者当为正殿(正寝、寝殿),设龙輶、神座;其北者为影殿,供奉仁宗帝后画像。其余可按方位分别对应,包括留居宫人的宫室、浣洗房、厨房等附属设施,以及陵使驻地用房等。

宋陵上宫、下宫之祭的内容和方式承唐制而变,到真宗时更加程式化,这在《宋会要辑稿·礼》和《宋史·礼志》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宋史》对于景德四年(1007年)正月真宗朝拜永安三陵的记载简单明了:“是夜,漏未尽三鼓,帝乘马,却舆、辇、伞、扇,至安陵,素服步入司马门行奠献礼,诸陵亦然。又诣下宫。凡上宫用牲牢、祝册,有司奉事;下宫备膳羞,内臣执事,百官陪位。”^[67]可见,上宫(献殿)之祭由文武官员助祭,献太牢三牲为礼,读祝文,是朝廷之公祭;下宫(寝宫)之祭由太监行事,供奉饮食,如宫内之私享。宋人对于陵上两宫并祭早已视为浑常,从具体内容来看,上宫之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下宫的地位相应下降,两宫之祭大体呈平衡态势。

巩义部分北宋帝陵封土前已发现献殿的重要线索,文献著录也相对清晰。浙江绍兴的南宋皇陵虽然規制简陋,但献殿的存在已经被考古发掘直接证实^[68]。根据文献记载的相应礼仪规范,无论“献殿”这种建筑究竟是何种结构或形式,宋代的“陵前之祭”都比唐陵更加正规。

和两宋同时并立于北方的辽、西夏、金三个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陵前之祭与寝宫供养之制不尽同于唐宋,相关文献记载也比较少。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太祖祖陵^[69-72],巴林右旗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的庆陵^[73],以及推测为辽景宗乾陵的辽宁北镇新立遗址^[74-77],在陵园内、玄宫位置前方都发现有大型祭祀建筑基址,结合《辽史》等记载,可以认定辽代存在类似唐宋上宫的陵前之祭。辽太祖祖陵的奉陵邑祖州城内建筑以奉祀、守护功能为主,“西北隅有内城。殿曰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仪,以白金铸太祖像;曰黑龙,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时兵仗

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78]。其中两明、二仪、黑龙、清秘四殿可能还兼具有唐宋皇陵下宫的一部分功能^[79],北宋欧阳修最早提出类似观点。他认为祖陵中的“明殿,若中国陵寝下宫之制。其国君死,葬,则于其墓侧起屋,谓之‘明殿’,置官署职司,岁时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学士一人掌答书诏,每国有大庆吊,学士以先君之命为书以赐国君,其书常曰报儿皇帝云”^[80]。另据《契丹国志》《辽史》等记载,部分辽陵附近还有一些具有唐宋下宫部分功能的“影堂”“影殿”或“凝神殿”等^①,也应该建在奉陵邑中。不过,同样是具有部分下宫功能的永庆陵“望仙殿、御容殿”等,根据《辽史》记载分析,应该是在陵园之内^[81]。

金代皇陵位于今北京房山,根据《金史》等文献记载分析,可以基本肯定有陵前礼仪性祭祀行为。由于遭到明末毁灭性捣毁和清代重建的破坏,金代建筑遗迹的真相尚待进一步揭示,相应制度的深入探讨也有待于更多的考古资料。

西夏各陵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下,地面建筑遗迹明显,陵园南门内、玄宫前地面上各有明显的献殿遗迹,除3号陵平面呈八角形外^[82],其余各陵献殿平面皆为长方形^[83-86]。在各陵园遗址范围内未发现疑似寝宫的建筑遗存,曾经发掘过位于整个陵区北端的一处建筑遗址^[87],平面为长方形,朝南略偏西,方向164°,南北350米、东西160米。整个建筑群规划整齐,有封闭式的围墙,自南而北分为前、中、后三个主院,内有2处大型宫殿遗址,两侧还有几组东西小跨院。其平面布局与唐宋皇陵的下宫相似度极高,笔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西夏某陵或某几座陵甚至全部九陵的寝宫类建筑^{[88]254}。

明朝皇陵祭祀之制,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前,为每年清明、中元、冬至三大祭,圣旦、正旦、孟冬、忌辰四小祭。大祭用牲牢、神帛、祝版,遣官行礼并由各衙门陪祭;小祭只上香、供酒果,虽亦遣官行礼,但无陪祭。明世宗改制为每年四大祭(清明、中元、霜降、冬至)、三小祭(圣旦、正旦、忌辰),但中元、冬至二节例只遣官行礼,各衙门官不陪祭,实际类同于小祭。与唐宋及以前相比,明代皇陵的祭

祀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明太祖孝陵开始,陵墓旁不再建寝宫、不再留置用于供养墓主的宫人,“诸陵惟中官洒扫,不遣宫女”^[89],彻底取消了寝祭;陵园中的奉祀场所惟有祫恩殿(即献殿或享殿)一处。如顾炎武所说,“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4]1160},这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清承明制,皇陵祭祀之礼没有重大变革。明清时期,皇陵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现实中有时甚至超逾了宗庙。乾隆八年(1743年),定皇帝亲谒陵之仪同太庙亲祭之仪,至此,皇陵在礼制上已经完全与宗庙并尊,从法理上确定了山陵与宗庙同等的地位。

事实上,上陵礼的推行已经连带影响了宗庙之制的变化,由天子各为一庙演变为七庙或九庙同堂异室、合食于太祖,甚至以寝园藏神主,极大地简化了宗庙制度。东汉之制:“雒阳高庙,四时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最初只供奉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世宗孝武皇帝)。其西(长安)庙,成、哀、平三帝主,四时祭于故高庙。东庙京兆尹侍祠,冠衣车服如太常祠陵庙之礼。南顿君以上至节侯(光武帝的直系祖先,舂陵节侯为汉景帝之孙、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光武帝高祖),皆就园庙。……所在郡县侍祠。”^{[44]3199}包括朱熹在内的宋代大儒对于“墓祭”大多持认可或包容态度,但朱晦庵本人对于庙制变革却颇有微词:“后汉明帝又欲遵俭自抑,遗诏无起寝庙,但藏其主于光武庙中更衣别室。其后章帝又复如之,后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庙皆为同堂异室之制。……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孙,而更僻处于一隅,既无以见其为七庙之尊,群庙之神则又上厌祖考,而不得自为一庙之主。以人情而论之,则生居九重,穷极壮丽;而没祭一室,不过寻丈之间,甚或无地以容鼎俎而阴损其数。”^[90]顾亭林也认为,上陵礼导致“陵之崇庙之杀也,礼之渎敬之衰也”^{[4]1158-1159}。上陵礼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庙的地位,而皇陵的地位则相应提高,进而成为国家祀典。“梁武帝、后周明帝始皆谒陵,唐太宗、元[玄]宗亦并行之。开元二十年(732年)敕: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4]1160}汉以后,皇帝陵墓在国家祭祀礼仪中的地位越来越

①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八之重熙三年兴宗诏将齐天太后(圣宗正后)“于祖州陵园内选吉地改葬,其影堂、廊庑等并同宣献太后(景宗皇后)园陵”(贾敬颜等点校本第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又,《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显州奉先军》载辽义宗显陵有“影殿”;同卷,《乾州广德军》载景宗乾陵有“凝神殿”。

高,追本溯源,皆滥觞于上陵礼。东汉陵前的石殿演化为皇宫正朝或宗庙大殿的象征,后代之“献殿”“享殿”“裨恩殿”“隆恩殿”等皆由此源出。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皇陵中虽然没有下宫,但寝祭并未完全消失,皇宫中的奉先殿承担了原先陵上寝宫的一部分功能^[91]。奉先殿最初建成于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每日朝晡,上及皇太子、诸王二朝,皇后率妃嫔日进膳羞,每月朔荐新”^[92]。《大明会典》将其功能归纳为:“朝夕焚香,朔望瞻拜,时节献新,生忌致祭,用常饌,行家人礼。”^[93]河北遵化清高宗裕陵开始在隆恩殿(献殿)东间暖阁内设仙楼,供佛像,另有书画、古玩收藏,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宋以前皇陵寝宫功能的局部恢复^[88]^[343]。此外,明清皇陵的祭品也容纳了一部分原来供奉于寝宫的膳馐。如明代诸陵大祭时帝后神位前正案的陈设为“每案木爵三,羊肉一,豕肉一,炙肝一,炙肉二,面食四,枣、栗、胡桃、(荔)枝、圆(眼)各一,汤一,茶饭各一,菜四,(帝后)二案共黝牛一,羊豕各一、奉先帛二段。……八陵陈设同,惟裕陵三后加筮豆一案、奉先帛一段,不加牲”^[94]^[172],茂陵、永陵等多位皇后合葬的诸陵皆准此制。诸陵小祭,“长陵等十二陵,恭让、恭仁二陵,共一百三十七案,陈设俱同,各爵三、果五,无牲、帛、祝文”^[94]^[184],“果五”为枣、荔枝、胡桃、圆眼、栗。大小祭皆于案前设香炉一、烛台二。

最后要强调的是,“古不墓祭”之“古”,是汉人之古,亦即秦代及其以前,特别是东周,未必关涉到夏商。以清儒为代表的后人未能尽解蔡邕等人“古不墓祭”本义之所自出,特别是明清皇陵上没有寝祭,导致理解出现更多歧义。先秦礼仪并非直线式的继承发展,三代礼不尽同乃是不争的事实,因而上古的礼墓之俗可能会因朝代不同而有差异,或者说,殷有礼墓之俗,夏、周不一定必有或与之完全相同。秦始皇造成的文化断层,直接导致了西汉祭祀礼仪前后多变甚至有时显得乖张,如史家班彪所云:“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纷不定。何者?礼文缺微,古今异制,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24]^[3130-3131]魏晋以后,对标三《礼》议礼显然更难超逾汉代。东汉上陵礼是帝王陵“墓祭”的开端,由此衍生的陵上之祭代有因革,“礼”“俗”互相浸润,整体上越来越受重视。事实上,“上陵礼”始自汉明帝,但其仪节之源必有民间因素,

东汉官员、平民墓葬前大量出现的石屋及神道碑刻、石人兽等,也是帝王国礼与民间习俗互动的见证。明太祖取消寝祭,是对传统陵墓祭享之礼最大的一次否定,西汉及以前的陵墓奉享之制至此已面目全非,此举也间接加剧了后人对古礼认识的混沌。

参考文献:

- [1] 王充. 论衡: 卷二三 [M]//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 论衡注释: 第4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 329.
- [2] 蔡邕. 独断: 卷下 [M]//影印《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3] 房玄龄, 褚遂良, 许敬宗, 等. 晋书: 卷二〇·礼志中 [M]. 吴则虞, 唐长孺, 杨伯峻, 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顾炎武. 日知录: 卷一五·墓祭 [M]//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定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5] 赵翼. 陔余丛考: 卷三二·墓祭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676.
- [6] 杨宽.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06-108.
- [7] 阎若璩. 四书释地·墉间之祭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210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327.
-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辉县发掘报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 [9] 杨锡璋, 杨宝成. 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性 [J]. 考古, 1977(1): 13-19.
- [10] 杨鸿勋. 妇好墓上“母辛宗”建筑复原 [J]. 文物, 1988(6): 62-66, 87.
- [11] 杨鸿勋. 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 [J]. 考古, 1982(4): 402-406.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 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 [J]. 考古, 1983(3): 206-219.
- [13] 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 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 1989(12): 1 057-1 068.
- [1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濮阳西水坡: 上册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2: 112-118.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112-121.
- [17] 孟子注疏: 卷八下·离娄下 [M]//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 732.

- [18] 班固. 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 [M]/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9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2 791.
- [19]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一·春秋左氏传·宣公四年·楚令尹子文语 [M]/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1 869.
- [20] 礼记正义:卷四七·礼记·祭义 [M]/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1 593.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第五册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00.
- [22] 黄盛璋. 魏享陵鼎铭考论 [J]. 文物, 1988(11): 45-47.
- [23] 梁思永, 高去寻. 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册 [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4-7.
- [24] 班固. 汉书:卷七三·韦贤传附子韦玄成传 [M]/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0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 [25] 礼记正义:卷一九·礼记·曾子问第七 [M]/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1 399.
- [26] 佚名. 三辅黄图:卷六·陵墓 [M]. 何清谷, 校注.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5: 348.
- [2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汉文帝霸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22(3): 47-59.
- [28] 王学理. 西汉阳陵园考古有重大发现 [J]. 考古与文物, 1991(2): 1, 96.
- [2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 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 1996-1998 [J]. 文博, 1999(6): 3-11.
- [30] 李岗. 浅议汉阳陵的营建规划 [J]. 考古与文物, 2006(6): 29-33.
- [31] 汉阳陵博物馆. 汉阳陵 [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7.
- [32]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汉武帝茂陵钻探调查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07(6): 23-30.
- [3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茂陵博物馆. 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11(2): 3-13.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 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 [J]. 考古, 1984(10): 887-894.
-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杜陵陵园遗址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3.
- [36] 佚名. 三辅黄图:卷五·宗庙 [M]. 何清谷, 校注.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5: 291.
- [37] 班固. 汉书:卷九·元帝纪 [M]/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298.
- [38] 司马彪. 后汉书志·第四·礼仪上 [M]/后汉书:第11册. 宋云彬,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3 103.
- [39]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偃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 [J]. 文物, 2007(10): 60-75.
- [40]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 [J]. 文物, 2011(9): 4-33.
- [41]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4.
- [42]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第一阶段考古报告 [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8.
- [43]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洛阳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勘探与2017年发掘简报 [J]. 中原文物, 2024(1): 12-21.
- [44] 司马彪. 后汉书志·第九·祭祀下 [M]/后汉书:第11册. 宋云彬,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3 200.
- [45] 应劭. 汉官仪:卷下 [M]/周天游点校清孙星衍校集《汉官六种》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90: 182.
- [46] 赵康民. 秦始皇陵北二、三、四号建筑遗迹 [J]. 文物, 1979(12): 13-16.
- [47] 秦始皇陵考古队. 秦始皇陵西侧“丽山飮官”建筑遗址清理简报 [J]. 文博, 1987(6): 3-32.
- [48] 王溥. 唐会要:卷二〇·亲谒陵 [M]/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55: 400.
- [49] 萧嵩. 大唐开元礼:卷三·杂制 [M]/影印清光绪十二年洪氏公善堂校刻本.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 33.
- [50] 欧阳修, 宋祁, 范镇, 等. 新唐书:卷一四·礼乐志四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364-365.
- [51] 萧嵩. 大唐开元礼:卷四五·吉礼·皇帝拜五陵 [M]/影印清光绪十二年洪氏公善堂校刻本.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 259.
- [52] 允时. 昭陵 [J]. 文物, 1977(10): 60-62.
- [53] 巩启明, 王保东, 李江红. 唐章陵调查简报 [J]. 文博, 2003(3): 3-9.
- [54] 张建林. 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 [J]. 考古与文物, 2013(5): 82-90.
- [55] 张建林. 昭陵寝宫遗址 [M]. 中国考古学会. 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6.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 405-406.
- [56] 张建林. 乾陵陵园遗址 [M]. 中国考古学会. 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7.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8: 464.
- [5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唐睿宗桥陵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11(1): 11-23, 91.
- [5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蒲城县文物局. 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11(3): 4-20.
- [59] 泾阳县文教局调查组. 唐贞陵调查记 [J]. 文博, 1986(6): 16-20.
- [60] 王溥. 唐会要:卷二〇·陵议 [M]/商务印书馆“国学

- 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395.
- [61] 欧阳修, 宋祁, 范镇, 等. 新唐书: 卷一九九·儒学·彭景直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 669-5 670.
- [62] 王溥. 唐会要: 卷二一·缘陵礼物 [M]//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405.
- [63] 傅永魁, 刘洪森. 河南巩县宋永昭陵区的考察 [M]//考古学集刊: 第 8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137-162.
- [64] 李攸. 宋朝事实: 卷一三·仪注三·英宗葬永厚陵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608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4: 158.
- [65] 徐松. 宋会要辑稿: 卷八一九·礼三七 [M]//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本: 第 2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1 333.
- [66] 徐松. 宋会要辑稿: 卷八一九·礼二九 [M]//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本: 第 2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1 075.
- [67] 脱脱. 宋史: 卷一二三·礼志·上陵之礼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 883.
- [6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绍兴宋六陵陵园遗址 2018 年考古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21(1): 85-93.
-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考古发掘的新收获 [J]. 考古, 2008(2): 3-6.
- [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 [J]. 考古, 2009(7): 46-53.
-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黑龙门址和四号建筑基址 [J]. 考古, 2011(1): 3-6.
- [7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辽祖陵: 2003-2010 年考古调查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2: 255-521.
- [73] 田村实造, 小林行雄. 庆陵: 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的调查报告 [M]. 李彦朴等译, 李俊义等校注.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21.
- [7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北镇市辽代帝陵 2012 ~ 2013 年考古调查与试掘 [J]. 考古, 2016(10): 34-55.
- [75] 万雄飞. 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取得重要收获——辽宁北镇新立辽代建筑遗址发现辽乾陵陵前祭殿和乾陵玄宫 [N]. 中国文物报, 2018-09-21(8).
- [7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辽宁省北镇市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重要发现——新立 M1、M2[M]. 边疆考古研究: 第 27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0: 59-65.
- [7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镇市文物处. 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 2015 ~ 2018 年发掘简报 [J]. 考古, 2020(11): 48-71.
- [78] 脱脱. 辽史: 卷三七·地理志一·祖州天成军 [M]. 冯家升, 陈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42.
- [79] 刘毅. 关于辽代皇陵的几点认识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3(3): 37-53.
- [80] 欧阳修, 宋祁, 范镇, 等. 新五代史: 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898.
- [81] 脱脱. 辽史: 卷三七·地理志一·庆州玄宁军 [M]. 冯家升, 陈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44.
- [8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 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328.
- [83]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 [J]. 文物, 1978(8): 60-71.
- [84] 韩兆民, 李志清. 宁夏银川西夏陵区调查简报 [M]//考古学集刊: 第 5 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277-284.
- [85]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许成, 杜玉冰. 西夏陵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 [86]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 西夏六号陵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 [87]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 [J]. 文物, 1988(9): 57-66, 77.
- [88] 刘毅.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 [M].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16.
- [89] 于慎行. 穀山笔麈: 卷一 [M]. 张德信,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4-5.
- [90] 宋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六九·杂著·禘祫议 [M]//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朱子全书: 第 23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 334.
- [91] 刘毅.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489.
- [92] 明太祖实录: 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己巳 [M]//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本: 第 2 册.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1 187.
- [93] 李东阳, 申时行. 大明会典: 卷八九·礼部·奉先殿 [M]//影印明万历十五年刊本: 第 3 册.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9: 1 411.
- [94] 太常续考: 卷四·长陵等陵事宜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599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4.